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邵明著

文学棱镜中的历史景观

——世纪之交历史叙事的文化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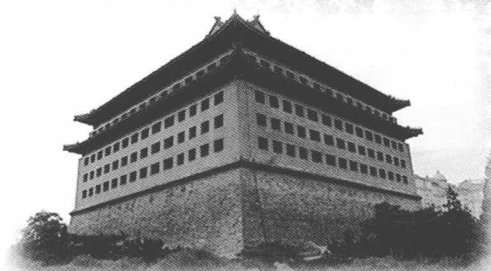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多维研究丛书

邵明著

文学棱镜中的历史景观

——世纪之交历史叙事的文化研究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棱镜中的历史景观——世纪之交历史叙事的文化研究 / 邵明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1110-560-5

I. 文... II. 邵...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4068 号

本书由中共安徽省委党校资助出版

文学棱镜中的历史景观

——世纪之交历史叙事的文化研究

邵明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846 发行部 0551-5108743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850×1168 1/32
责任编辑	江 琛 朱丽琴	印 张	10.2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60-5

定价 19.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1] 绪 论 时代诊断与历史叙事

上 篇 “史传景观”:多元价值的异质性拼贴

[14] 第一章 政治文化规制的叙事主题

[14] 第一节 “农民起义”

[25] 第二节 变 法

[35] 第三节 “民族融合”与“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

[42] 第二章 基于现代性价值的历史判断

[43] 第一节 “前现代性政治”批判

[53] 第二节 市场经济与民主价值

[64] 第三节 质疑“近代化”论述主导的历史想象

[72] 第四节 人文情怀

[83] 第三章 大众趣味与历史戏说

[84] 第一节 “圣君”崇拜

[92] 第二节 武侠、灵异之事

· [101] 第三节 情、欲奇观

中 篇 “新历史”镜像：“现代性张力”的叙事呈现

[113] 第一章 “祛魅”：“陌生化”叙事的审美意识形态效果

[115] 第一节 纪元的意义

[122] 第二节 身份符码与个体际遇

[129] 第三节 革命支点性“场景”的重绘

[139] 第二章 多层面的现代渴望

[140] 第一节 现代“器物”情结

[147] 第二节 政治现代化诉求

[159] 第三节 基于文化批判的现代性认同

[170] 第四节 迷雾中的真相 偶然中的必然

[182] 第三章 反思现代性

[184] 第一节 故园之叹

[192] 第二节 极端体验

[205] 第三节 理解“差异”

下 篇 “革命历史”重述：缝合革命与市场的价值裂隙

[220] 第一章 起源新述与价值重赋

[220] 第一节 重写起源故事

-
- [227] 第二节 民族主义与“抗日战争”叙述
- [232] 第三节 民主意识与“国内革命战争”叙述
- [243] 第二章 重塑“革命英雄”
- [244] 第一节 “紫色英雄”:市场时代的“精神高标”
- [251] 第二节 与知识和解
- [260] 第三节 爱欲躯体
- [268] 第四节 传统片羽
- [281] 第三章 抚平历史伤痕
- [282] 第一节 革命/平等
- [292] 第二节 对于“路线斗争”与“文革”的叙述
- [308] 结 语 现代性:历史与现实的本质之真
- [316] 主要参考书目
- [323] 后 记

绪论

时代诊断与历史叙事

自1984年“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政策提出以来，^①由市场经济推动的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过程终于获得了历史性的重新启动。而在1992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动员令发出之后，^②“市场经济”因为获得国家话语的明确肯定而在实践中更为迅捷地展开，也更为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社会基于市场原则（以及因之衍生的现代逻辑）的重新组合，并诱发了社会文化空间内各个层面的价值冲突与妥协，由此导致的当代中国社会高度的文化复杂性，已非“新时期”这一侧重于描述国家政策“拨乱反正”意义的政治性历史分期概念所能完全涵纳。近年来，有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为这一时期重新命名，从而产生了诸如

①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1984年10月20日。

②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共十四大报告，1992年10月12日。

“无名时代”、①“准个体时代”、②“后新时期”、③“后革命时代”、④“消费时代”⑤等历史分期概念。这些概念从不同的角度敞开了当代中国社会的隐蔽真相及其形诸文学的具体方式,必使此后有关时代与文学的讨论能够更为便捷地接近本质。

事实上,上述概念都体现了对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价值并存状态的不同把握方式,就本书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介入历史叙事,旨在分析诸种类型历史叙事的文化价值表述这一研究任务而言,辨明当代中国社会多元文化价值的复杂层次及其结构关系,以明确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自然是基础性的工作。具体而言,所谓多元化的社会文化价值可以析分出下述不同的层次。

首先,革命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社会的一元化统摄解体,社会文化空间日益分化出既有价值重叠又内含冲突要素的异质性文化价值,其依循各自逻辑展开后形成了诸种文化价值冲突与妥协导致的复杂文化情境。

① 陈思和:《论 90 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复旦学报》,2001 年第 1 期。

② 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九十年代小说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2 年版。

③ 陈晓明:《勉强的解放:“后新时期”女性小说概论》,《当代作家评论》,1992 年第 3 期;徐贲:《从“后新时期”概念谈文学讨论的历史意识》,《文学评论》,1996 年第 5 期;吴义勤:《九十年代小说格局》,《社会科学战线》,1998 年第 6 期,等等。

④ 程光炜:《“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南方文坛》,2002 年第 4 期;贺绍俊:《从革命叙事到后革命叙事》,《小说评论》,2006 年第 3 期;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 年第 3 期;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等等。

⑤ 例如《文艺争鸣》2006 年第 4 期组织的消费时代文学讨论;赵学勇:《消费时代的“文学经典”》,《文学评论》,2006 年第 5 期,等等。

具体而言,由于市场经济实践的展开,国家体制外的社会空间便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渐趋扩大,国家与社会开始出现分离态势,并进而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空间日益分化为政治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或曰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三类文化空间鼎足并存的状态。^①此三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认同市场经济实践的逻辑一致性,这是其达成妥协的历史性前提,不过,其内在价值冲突也显而易见:政治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坚持对于“革命”与“市场”的双重认同,因此,“革命”原则便规制了基于“市场”的文化逻辑在当代中国社会超出经济范畴的方式,这与精英文化全然认同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文化姿态,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大众文化虽由作为现代性经济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所催生,但是其以快感体验为核心,疏离超越性价值这一关键特征却与前二者特定价值坚守姿态相抵牾。^②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虽经20世纪以来历次取向各异的政治、社会、文化“革命”冲击、震荡、批判、否定,但是其最具原型意义的价值内容,仍复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遗存于大众心理深层,并成为大众文化价值中与此外二者颇具矛盾性的维度。上述三种价值歧异冲突而又妥协共存的态势反映了当

①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空间日益分化为政治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文化价值并存态势之描述,请参阅周宪《当代中国审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在本书的具体运用中,“政治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指称国家政权运作特定维度的两个概念,其意义基本重叠,不过,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分化态势并与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相对照时,使用“政治文化”概念;而在描述作为政权运作重要内容的将社会个体“质询”、“召唤”为特定主体的意识建构过程时,则使用“主流意识形态”概念。

② 参阅[西]奥尔特加《大众的反叛》,刘训练、佟意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代中国整体性的文化特质。

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价值状况所导致的复杂文化情境。

有论者在以“后革命时代”概括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特征时指陈:“这个新语境的最基本特点是:革命时期建立的政治体制和后革命时期的经济转型并存。”^①这一描述揭示的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内部的多重价值重叠状态,正是本书讨论此问题的起点。具体而言,一方面,“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逻辑必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构成内容;另一方面,所谓的“经济转型”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展开,然而,这一经济实践及其延展的文化逻辑却与前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价值歧异,由此,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价值缝合之所。

再次,基于市场经济的现代性体系内部的价值对立并存所导致的复杂文化情境。

在社会学研究中,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主义组织社会的过程,一般被指认为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或社会现代转型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但是,在此过程中,由于工具理性日益增长的霸权所导致的人性异化状态,转而催生了审美现代性对此过程的批判。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的价值对立,便构成了“现代性的张力”——恰恰是现代性的完整景观。所以,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说:“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②但是,此种持续的冲突因为总

①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当代文坛》,2006年第3期。

② [英]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转引自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7页。

是落实于深刻的妥协而从未导致现代社会的解体,这正是现代性的暧昧之所在。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历史性启动和大规模展开,工具理性与审美现代性的价值对立与冲突在中国社会亦初见端倪,并导致基于现代性价值认同的精英文化空间亦处于价值混杂状态。

简而言之,市场经济及其内含的种种现代性价值逻辑(包括其自我矛盾)在中国社会的急剧展开,势必与这一社会内部本已足够复杂的价值体系与结构性存在产生广泛的冲突与妥协,从而导致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价值的多重复杂性。在此宏观文化眼光的引导下,细致分析当代多元文化价值在历史叙事中的回响及其运作逻辑,便可以全面理解当代诸种历史叙事的文化表述。在此基础上,抽取种种历史叙事复调混杂、暧昧不明的价值言说之中最有意义的现代性价值维度,同时辨明那些在有意无意间淡化、淹没这一价值维度的文化质素,必然能够对处身于特殊时代的历史叙事的文学史乃至文化史意义作出准确的判定,并由此获致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逻辑运作的深刻理解。

进而,本书所采用的“历史叙事”概念,实际上包含下述种种不同类型的事涉历史生活的文学性书写。

第一种类型即传统意义上具有史传特征的“历史小说”,此种历史叙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依托,并辅以文学性的虚构,以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叙事主体的历史判断,等等。便如郁达夫的表述:“现在所说的历史小说,是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

再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而言。”^①这一历史叙事形态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从明代的《三国演义》(罗贯中著)到建国后的《李自成》(姚雪垠著),俱可归入这一类别。其当代的承续与发展则如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的《白门柳》、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历史叙事。

第二种类型往往在叙事建立的特定的历史时空之内,叙述虚构的事件与人物,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称为“革命历史小说”的历史叙事便在较大程度上具有这一特征。以曲波的《林海雪原》为例,尽管杨子荣有其原型人物,但是小说并非此原型人物的传记,林海雪原剿匪的战斗定有其事,但小说中所描绘的战斗却非依托战史的叙述。当然,在“革命历史小说”之中,史实与人物往往都有比较具体的原型,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此种类型特征的历史叙事中,于特定历史时空内活动的人物和展开的事件已经全然出于虚构而难觅具体的原型。此种类型的历史叙事在当代又有两种具体的形态:其一是以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陈忠实的《白鹿原》等作品为代表的被命名为“新历史小说”的历史叙事。^②其二是以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石钟山的《父亲进城》、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等作品为代表的正以“新革命历史

①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238页。另外参阅齐裕焜在《中国历史小说通史》中对于诸种关于历史小说定义较为全面的辨析与概括(齐裕焜:《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3页)。

② 陈思和最早使用此概念,见陈思和《关于“新历史小说”》,《文汇报》,1992年9月2日。

小说”之概念获得指认的历史叙事。^①这两种类型的区分基于其文化价值立场的差异,前者自否定阶级论史观入手以传达内在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冲动,是精英文化“新启蒙主义”文化论述的文学维度;后者试图在淡化阶级论的基础上缝合“革命”与“市场”的价值断裂,是传达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诉求的“主旋律文学”。^②

由此,本书在“历史叙事”这一概念下着重讨论三种关涉历史生活的文学书写类型:1.“历史小说”、2.“新历史小说”、3.“新革命历史小说”,文本类型区分的依据既在于其选材与史实的关涉程度,也在于其文化价值立场,并在较大程度上依循文学史的既有判断。之所以凭借“历史叙事”这一概念将此三种差别甚大、过去较少被并置研究的文本类型置入同一讨论领域,^③其内在依据来自本书所持的“历史观”。

传统历史观念强调通过历史著作以及依据史实写就的文学作品能够而且必须探察、再现历史真相。所以,有作家强调:“历史小说反映历史生活,应当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并且反

① 参阅刘复生《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邵明:《“新革命历史小说”的意识形态策略》,《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

② 参阅刘复生《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黄发有的《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历史迷惘》(《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5期)曾将本文所指的“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并列讨论;郭剑敏的《中国历史小说创作三元形态论》(《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5期)、江腊生的《虚拟与消费——90年代以来小说游戏历史的现实诉求》(《文学评论》,2006年第1期)也曾有过类似姿态的讨论,等等。

映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近年来随着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学界,关于历史书写(包括史学书写与文学书写,不过,在“新历史主义”理论中,这二者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例如海登·怀特那句广受引用的名言:“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可以说半斤八两,不分轩輊。”^②)的基本态度转而成为否定其具有再现历史真相的可能性。进而,历史本身便具有不可知性,因为史实只有在进入叙述文本之后才能为意识所把握,而主体对于史实的叙述必然基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由此便难以避免扭曲、遮蔽与增删。况且,语言表达是及物的能指链的滑动过程,它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现实,云云。^③

然而,就本书的历史观而言,历史具有总体上的可知性是讨论的前提。若说由于当事人有意无意的隐匿,或者由于特定意识形态的扭曲、遮蔽、增删,而使得历史真相难以枝枝节节俱事在录,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若片面强调意识形态的障碍作用,全盘否认获得真相认知的可能性,未免危言耸听。在齐泽克看来,真实界的“原质”是无法被意识形态完全驯化的,这正是人们穿越意识形态幻象的入口,也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永远无法强大到足以彻底淹没世界的地步。^④例如,人类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阶段的基本历史真实,岂是种种意识形态迷雾可以全然

① 凌力:《星星草·后记》,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701页。

② [美]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2.

③ 参阅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0~170页。

④ 参阅[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笼罩遮蔽的？进而，若语言真的绝对无法把握现实，那么，人类以语言为工具而获得的种种真理性认识何以成为可能？

基于上述历史观讨论关于历史生活的文学性书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方面，即便围绕史实性材料所组织的叙事也不能全然免于虚构的成分，这既因为史料往往不足，也因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必然渗入叙事过程。另一方面，即便全然虚构的叙事也必能触及历史真相，只要叙事者的意识形态不至于割断民族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若果如此，其作品必然缺乏直击人心的力量），便自能写出其事虽无、其理必有的历史生活景观。也就是说由文学棱镜所折射的历史景观，总是在实与虚之间获取历史之真，传达与历史无法割断联系的当代社会的文化渴望。既然如此，将上述三种类型的历史叙事并置讨论，就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并可以使原本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却因形式之辨以及文学史固定判断之囿而分属不同讨论领域的关于历史的文学性言说获得整体性的研究，进而可以对内在于叙事的历史本质之真作出富有启发意义的揭示。

上 篇

“史传景观”：多元价值的异质性拼贴

具有史传特征的历史小说创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盛况不衰。其中，因应文化语境变迁而风貌出新者，则如凌力的《倾国倾城》、《少年天子》、《暮鼓晨钟》，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代逸才》、《张之洞》，颜廷瑞的《庄妃》、《汴京风骚》，刘斯奋的《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吴因易的“唐宫八部”，完颜海瑞的《天子娇客》，杨书案的《孔子》、《炎黄》、《老子》、《孙子》，石楠的《寒柳——柳如是传》、《陈圆圆·红颜恨》，寒波的《石达开》，张笑天的《太平天国》、《刘铭传》，陈斌的《李鸿章》，杨立平的《皇太极》，李全安的《左宗棠》，潘传学、潘传孝的《张献忠》，成一的《白银谷》，邓九刚的《大盛魁商号》，等等，以及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等反映现代历史的作品。

此类上承《三国演义》（罗贯中著），下接《采石矶》（郁达夫著）、《李自成》（姚雪垠著）的作品作为“历史小说”之共性，正在